



中国考古告诉我们什么

□ 赵宾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考古研究机构和管 理、保护、展示机构增长迅速，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文物保护作用和社会服务功能成效凸 显，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愈发重要。考古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及分析，实证了中国超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元谋人、西侯渡人和巫山人等为代表的距今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以及全国许多地区距今几十万年至几万年不等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化石的发现，显示出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很可能和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邦国—王国—帝国”发展历程，已经找到实证并得到学界认可。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文化框架、文化谱系、文化格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绩斐然，成效卓著。“查海时代”（距今约 9000—7000 年）、“仰韶时代”（距今约 7000—5000 年）、“龙山时代”（距今约 5000—4000 年）的确认和命名，对于中国考古事业来说，既是基于自身学科探索而获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是运用自身学科方法而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以西汉长安城、唐长安城、辽上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为代表的都城考古，以秦始皇陵和汉唐帝陵为代表的帝陵考古及汉、唐、宋、元、明、清墓葬研究，以瓷器、金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遗存研究，使得中

华古代帝国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以秦、汉至宋、元、明、清考古研究为基础，中国学者又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为纽带，将中国考古置于世界考古研究的范畴，奠定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考古发现和 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地区、很多时段上的历史空白不断得到填补，越来越多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些地区的古代先民在与中原地区及相邻地区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瑰丽篇章。同时，也正是通过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向来是开放的、互通有无的，中国通过边疆地区走向世界，世界也因边疆地区联系中国，从而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历史背景及动因。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探索和揭示中华文化、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变化规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考古学立命与发展的基石。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技术方法和特色理论。其合理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遗存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可行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被不断借鉴到考古学的必然性，以及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的多元性与多样性。

遗存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了田野考古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是搜集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层位学和形态学是对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的基本方法。

遗存的聚合性和创造遗存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划分“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与聚类研究的有效理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一个

概念，更是如何对考古遗存进行研究 的理论。依据考古遗存划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既是一群东西，也是一群人，更是由一群人所创造的一段历史。因此，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总路线，应该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活起来。

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时代性和创造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体或族群的历史变迁，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文化谱系论”）是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划分考古学文化系统、探讨考古学文化演进格局的重要指导理论。

“修国史”“写续篇”和揭示中国人 类、文化、族群、国家历史演进过程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以“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古国—方国—帝国”论为代表的“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理论”（“文明道路论”）是探索各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共同体或族群何时进入国家阶段以及如何发展演变的重要指导理论。简言之，“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是关于如何开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

考古学遗存和考古学文化蕴含了无限的自然信息与人文社会信息，即展示在世人面前生封的地下世界和物化的地下社会。所以，如何对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十分复杂而多面的问题加以科学揭示和阐释，最终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科任务和理想目的，决定了考古学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总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应是多元、多面、多层次的。但目前 在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和把握程度上 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相对成 熟一些，有的还需作进一步完善、 深化和创新。不断发展中的田野考古 发掘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层位学、 考古形态学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中的 考古学文化理论，不断发展中的考古 学文化谱系理论和文明道路理论，以 及正在探索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 和社会解释复原理论，构成了“六位 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 体系和方法体系。

总之，中国考古学为“通古今之变 化”奠定坚实研究基础，以“发思想之 先声”作为光荣学术使命，通过发掘和 研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 通过传承和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把 握历史趋势，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 取得了重要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

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传承工 作。考古学勇当文物保护的先锋，在 成为促进文物事业发展重要支撑的 同时，还将学科定位纳入到了文物保 护的范畴，从而开始发挥文化遗产保 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仅就历史时期 而言，以秦、汉至宋、元、明、清田 野考古和研究为依托，建设了秦始皇 陵、汉阳陵、汉魏洛阳故城、唐大明 宫、上林湖越窑、永顺老司城、景德 镇御窑厂、圆明园等一大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并通过现代化高科技手段 和展示形式，将文献历史以文物历史 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真切 感知物质文化史的无穷魅力。

从社会影响力和发挥的学科作用 而言，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人民共 同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业，全民对考古 学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公众考 古”或“公共考古”已经出现，并在 逐步发展和完善。无论是专业人士还 是社会公众都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 的“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 “遗产”，不仅是学术研究所凭借的 “材料”，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 “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 传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 产”和“财富”，是包括考古学家在 内的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 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已 经让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愈发清晰地认 识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 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 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 考古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 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民族或国家部分 地恢复其历史面貌、唤醒其历史记忆。

总之，中国考古学为“通古今之变 化”奠定坚实研究基础，以“发思想之 先声”作为光荣学术使命，通过发掘和 研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 通过传承和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把 握历史趋势，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 取得了重要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考古看文明



杨素的算盘

如果不是因为和隋杨帝之间不光彩的勾勾搭搭，杨素在历史上可能只以名将而非奸臣留名。

杨素，字处道，出身弘农杨氏，属名门之后，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然衰落。但家道中兴的迹象似乎在杨素身上很早就显露了出来。杨素年轻时就展现出了“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属文，工草隶”的特点，加之“美须髯，有英杰之表”，可称得上“才貌双全”。他曾经为周武帝起草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周武帝大加赞赏，勉励他要好好努力，不愁日后富贵无望。杨素从容答道：“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杨素早期为北周权臣宇文护所信用，后来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亲掌朝政后，对杨素有所隔阂。杨素却又在此时一再为其父当年战死而未受朝廷追封一事上表申理，周武帝大怒，“命左右斩之”，杨素面不改色，大声叫道：“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未料这一来周武帝倒是欣赏起他的气魄了，“壮其言”，不仅下令追谥其父，而且对杨素青睐有加，“渐见礼遇”。

杨素的自信无疑是有底气的。他不仅能文，更兼能武，周武帝时期就屡立战功，更值得一提的是，眼光独到，识人精准，还在隋文帝杨坚担任北周丞相时，他就与杨坚“深自接纳”，深得杨坚器重。杨坚代周建隋之后，继续对杨素委以重用。杨素也不负所望，与高颎、贺若弼等组织实施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并在此过程中，与同为行军元帅、后来的隋杨帝

坚守正道方为立身之本

□ 思 泉

杨广产生了交集。

统一陈朝后，杨素继续平南定北，战功赫赫，本人也一路攀升到人生顶点，先是出任尚书右仆射（副相，当时尚左），与尚书左仆射高颎专掌朝政，后又接替高颎出任尚书左仆射，权倾朝野。不仅如此，但凡与他沾亲带故的，无不雨露均沾，“亲戚故吏，布列清显”“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时人感叹，贵宠之盛，“近古未闻”。

然而，尽管事功显赫，杨素为人却有着致命的缺陷。一是贪冒财货、骄纵奢靡；二是心胸狭隘、党同伐异，朝臣有与其违作者，虽至诚体国，无不深受其中伤排挤。这也引起了杨坚的警惕，虽然对其仍一再赏赐，但逐渐剥夺其权，“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特别是到了后期，实际上已不再让杨素插手朝政。

古语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功遂身退，天之道”。尽管身负震主之功，且隋文帝已然怀有猜忌之心，但杨素却甘愿就此退守，权势、金钱，他一样都不想失去。正是怀着这样的焦虑，当晋王杨广找上门来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一个欲借对方之力劝说隋文帝废立太子，一个想为自己拉长线钓大鱼。最终，在杨素以及

独孤皇后的帮助下，杨广篡位登基，杨素作为一再立下大功的两朝元老，也收到了杨广的回报，“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杨素的如意算盘如愿以偿，然而，此时的他却发现，表面更加宠幸的背后，未必比过去更加安全。相比隋文帝，杨广对于杨素更为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杨素病危时虽然派人殷勤探问、“赐以上药”，私底下却“密问医人，恒恐不死”。杨素也自知杨广心意，干脆拒绝服药，坐以待死。其实，拒绝服药又何尝不是担心杨广送的乃是毒药！最终以哀荣而死的杨素看似通过“奇策”延续了荣耀，却因这一段历史，不但使生前功名蒙羞，死后也沦为乱臣贼子的代表，为后人所鄙弃。

程颐的坚守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欲重新恢复新法，尽管已闲居洛阳讲学近 10 年，但被视为旧党代表人物的程颐，仍被宋哲宗下诏“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永不叙复”；不久又被贬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看管，一待就是三年多。元符三年（1100 年）正

月，宋哲宗病死，宋徽宗即位，程颐先是被移送峡州，之后又获赦免，准许回洛阳居住。可惜这份好运没有延续多久，崇宁元年（1102 年），程颐又被当政的蔡京列名所谓“奸党”，由宋徽宗亲书，刻石立碑，宣告天下。大观元年（1107 年），75 岁的程颐溘然去世，走完了坎坷起伏的一生。

所谓知子莫若母，程颐、程颐两兄弟小时，其母侯氏曾在程颐书上写下“殿前及第”，在程颐书上写下“处士”。后来，程颐果然先中进士，而程颐则在应试落第后，绝意科举，一生主要以“处士”身份讲学。侯氏还曾评价两个儿子“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意谓不担心他们不能正身直行，却担心他们不能懂得屈伸、与世浮沉。事实证明，二程一生，虽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虽屡颠簸跌而宁折不弯，亲身实践了自己所提出的“中、正、诚、敬、恕”的立身主张，无愧于“纯”“正”之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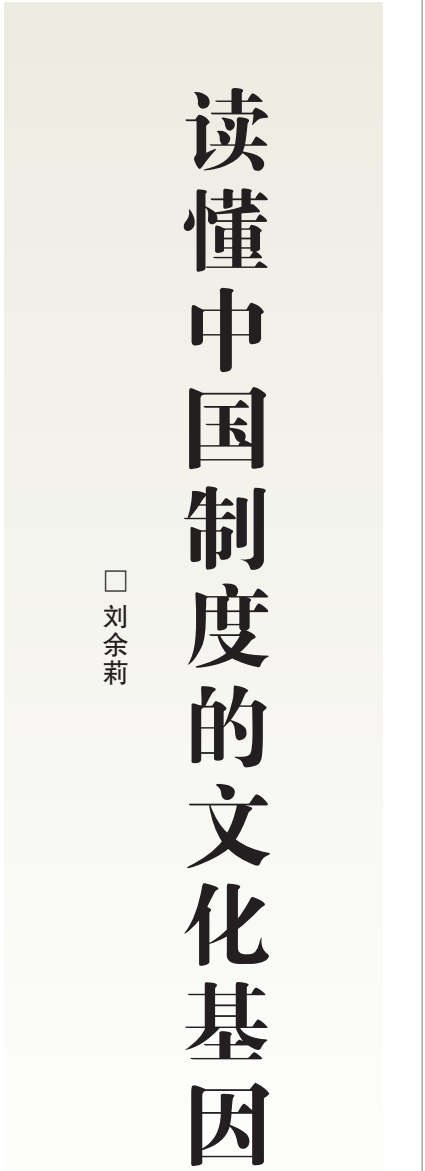
从涪州回到洛阳后，程颐的学生们见到阔别许久的老师，惊奇地发现，尽管经历了贬官的打击、流放的颠沛、穷苦之地的磨砺，但程颐非但不见消沉枯竭，反而益加精神抖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昔”。学生们不由得疑惑地询问老师，程颐回

如何真正读懂中国制度以及浸透其中的中华文化基因，看清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未来走向的作用与影响，已经成为当前的一大重要课题。而要 应答这一课题，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与深入 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老子指出，求道的方法与求学不同：“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古圣先贤正是通过无为、无知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为、无所不知。这与西方人求知识的方法截然不同。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所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寂而常照，照而恒寂。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也并非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用“为学”的方法来“为道”，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的困难。

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形成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在这种“一体”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得以延续至今。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遵从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这种世界观、思维方式、道德观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如今，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 5000 多年



□ 刘余莉

读懂中国制度的文化基因

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皆非凭空出现，一定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要读懂中国制度，必须首先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然而，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容易。现在很多国人连古籍经典中的汉字都不认得、不理解，又如何深入经典，理解其中深邃的义理呢？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正确应答，不仅决定了中国的走向，也决定了世界的未来。因此，注重汉字研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制度的前提。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人的一生，都会面临“求”与“弃”的问题。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能拥有美好的生活，“求”本身没错，也正因为有了“求”，人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发展。每个人也当然都不愿意承受痛苦，最好一辈子都能够无灾无病、无忧无虑。然而，既然有“求”，就会有“求之不得”的烦恼；既然有“弃”，也会有“弃不掉”的苦闷。那么，如何处理“求”与“弃”？如何化解烦恼与苦闷？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必须“得其道”。只有经由“道”得到的，才能心安，才不会担惊受怕；也只有经由“道”摆脱的，才能长久，才没有后顾之忧。反之，不义而富且贵，终归是过眼浮云，甚至让人反受其害。就如我们所看到的，为求取富贵，为维持权势，杨素欲效仿吕不韦奇货可居却贻羞后世；而身处患难贫贱，程颐却因为坚守本心，浑然不觉烦忧何在。

所谓正道，如前所说，就是一个人立身的依据、行事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又所谓大道至简，这些依据、道理、价值、意义归结起来，就是老实做人、干净做事、踏实行路。然而，看似简单的几个字，能够做到且一以贯之，确实殊为不易。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